

"80后"批评家文丛

周明全 策划

陈思和 主编

后革命时代的焦虑



徐 刚 /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80后" 云南人民出版社
隆重推出
批评家文丛

后革命时代的焦虑

“80后”批评家文丛

徐刚 /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后革命时代的焦虑 / 徐刚著. — 昆明 :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7-222-11231-5

I. ①后… II. ①徐…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33730号

策 划: 周明全
责任编辑: 苏映华 文艺蓓
装帧设计: 马 滨
责任校对: 刘 焰
责任印制: 洪中丽

后革命时代的焦虑

徐刚◎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 昆明卓林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云南人民出版社地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 邮编: 650034 // <http://ynpress.yunshow.com>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787×1092毫米16开 // 15.375印张 // 230千字 // 2013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2-11231-5 // 定价: 30.00元

总 序

陈思和

我先声明一下，这套丛书的策划者不是我，而是几位年轻朋友。今年5月我去北京师范大学开会，周明全和刘涛来访，说起云南人民出版社正在编辑一套“‘80后’批评家文丛”，书稿已经齐全，想请我当一个现成主编。这样的情况我很少遇到，以前凡是我挂名做主编的丛书，质量姑且不论，一般都是我自己组稿或者策划的，很少有这样现成的主编挂名于封面之上，我会感到不安。但是这套书的情况比较特殊，其一是青年人的书，尤其是“80后”的文学批评家，目前大多数都在高校里艰难地挣扎奋斗，文学批评也不是什么畅销书，我有机会支持，一定会尽些绵薄之力，这符合我在工作中一贯的追求；其二，这里所选的八位青年批评家，至少有四位是我熟悉的青年朋友，其他几位的文章也常见于报刊，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所以，我犹豫一下也就答应下来。原来想，虽然不是我主动策划编辑的丛书，但我可以通过阅读文稿，为丛书写篇导论，尽些主编的义务。不过这个念头很快也被打消。当我读周明全的论文集《隐藏的锋芒》电子文档时，读到了其中一篇《顽强而生的“80后”批评家——兼论当代文学批评的流变及“80后”批评家个案分析》，写得很全面又到位，深得我心。我觉得就是为策划这套丛书而写的，里面论及的几位青年批评家的作品，也都收入了本丛书。因此，我以为明全这篇论文才是本丛书绝佳的序文。我建议他不妨拿出来印在丛书的前面，给读者一个完整的导论。

于是，我似乎也可以不必费时去另辟蹊径，写什么导论了。

不过既然答应了担任主编，总还是要说几句话，这些话也是现成的。前几天中国现代文学馆所聘的第二批客座研究员，在复旦大学举办一个

“新世纪文学教育”的研讨会，我被邀在第一场做了主题发言。起先并没有做专门的准备，可是听了前几位发言者话题中屡屡讲到“学院派批评”，我有感而发，谈了一些自己平时所感所思的问题。因为没有草稿，现在回想也记不清楚当时的具体论述，只能把大致的意思在这里再说一遍：

“80后”的批评家，大多数都来自学院，受过专业教育，具有高等学历，也有很多批评家毕业后依然服务于学院。那么，是不是他们的批评，都是学院派批评了呢？

文学批评对文学创作的意义，与以前相比，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权力意识形态对文学创作的领导，主要是通过文学批评来体现的。所以，那个时候的批评阵地主要是作家协会以及相关政府部门，当时的批评家，主要也是思想文化部门的领导者和管理者，他们肩负着舆论导向的责任。他们的批评体现了权力的声音，批判和赞扬，都决定了作品、甚至作家的具体命运。这种权力意识形态的文学批评，从20世纪90年代逐渐改为奖励机制的舆论导向策略，批评本身渐渐式微，不再有多大的威慑力量。现在经常会在各种场合听到所谓“批评缺席”“批评被边缘化”之类的抱怨，其实这何尝不是好事？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批评从来就没有缺席过，只要看我们的批评梯队已经从50年代生人到80年代生人一代一代地成长，就是一个证明。我们在文学创作领域不一定讲得清楚每一年代生人的代表作家和代表作，但是在当代批评领域则是清清楚楚的，高校学院的研究生培养制度就是一个生生不息的人才源泉，当代文学的教学、研究、阐释，以致近年来国际汉学的重心也朝着现当代文学和文化现象倾斜，文学批评的专业刊物运作、围绕文学作品的学术研讨，都在正常地进行发展，为什么就“缺席”了呢？事实上，我以为“缺”的，不是批评本身，而是长期以来把批评与权力意识形态挂钩而形成的批评家的“权威”、批评背后的话语“权力”以及对作家指手画脚，并掌生杀大权的“领导”身份。“批评家”的特殊身份已经丧失，批评家只能回到具体的民间工作岗位上，做一份属于自己的工作，我认为是中国文艺走向正常和自觉的前提条件。

随着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发展和大学学位教育制度的完善，文学批评逐渐向两大模块转移，形成了媒体批评和学院批评的模式。在“文革”以前，媒体只是权力的喉舌，学院是被改造的对象，基本是不存在纯粹意义的媒体批评和学院批评的。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情况不同，媒体背后不仅有权力的背景还有商业的背景、利润的背景，媒体的声音就变得复杂诡谲了。媒体批评当然不能排除权力意识形态的导向，只是其作用更为隐蔽，表面上呈现的往往是商业利益作为推手。媒体批评呼风唤雨，左右了社会的一般舆论导向。而学院批评又呈现出另外一种面貌。严格地说，学院派是不介入一般媒体层面的，学院批评的主要场域在大学讲堂、学术刊物和高端会议论坛，言说的对象是学生、同行和专业人士。很多人批评学院派讲究论文规格、专著等级、刊物品质以及玩弄概念游戏，这些表面上为人诟病的症状，恰恰是学院派企图保持专业独立性和拒绝来自社会媒体（包括隐藏其后的权力）诱惑的努力，学院派以艰涩繁复的行规来维护知识的纯洁性，与媒体批评划清了界限。学院派不是不关心当代文学的现实意义，而是通过理论解读和文本阐释，在文学的社会功利性、大众性、现实性以外，另外建立一个批评的行业标准体系。学院批评仍然是建设性而非自娱性的，不过它追求的是在更为抽象层面上与作家以及同行们的精神交流，它是利用作家作品的材料来表达对于当代社会、文化的看法，它以不随波逐流、清者自清的态度形成了冷寂、沉稳、独立而博学的各种学派，它与活跃在社会大众领域的媒体批评正好形成了两种互为照应的批评声音。

媒体批评与学院批评的区别，不是以批评者的身份来决定的。不是说，有了一张高学历的文凭就戴上了“学院派”的桂冠，也不是说，一个从学院出来的批评家发表的意见都是学院派的声音。所谓学院批评还是媒体批评，主要是看其批评的环境。学院的批评家自然是应该在媒体上开讲座，写书评，在各种新书发布会或作品讨论会上发表看法，但这个时候他并不代表学院批评，更不能以学院派自居，他仍然是以一个媒体人的身份在对大众说话，依然是属于媒体批评。我从不反对学者利用媒体向大众传播文化科学知识，努力把自己的学院背景彰显出来，尽其可能抵制商业社

会中权力与利润对媒体声音的双重制约。尽管这种努力可能收效甚微，但仍然不失为自己的声音。其实我对这样的声音也是迷恋的，并且一直在实践中尝试这种声音在现实社会中发展的限度与可能性。我也不反对学院批评利用媒体对当代文学发出尖锐批评，但既然是带了学院的背景从事批评，那就要使批评尽可能具有独立的学院立场和说服力。——说到学院立场，我还想扯开去说几句，由于人文科学的特殊性，如果学院批评家要做一个自觉的人文知识分子，走出学院，走进社会也是必然的实践，但他所面对的环境就变得极为复杂，要在权力与商业双重制约下的媒体发出第三种独立的声音，要在介乎学院与媒体之间的第三种途径进行探索实践，并不是充满鲜花的途径。年轻的批评家们怀里装着高学历的证书，满腹经纶、满志踌躇，企图走上社会舞台，拨动媒体风云的时候，我建议先要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你是有可能利用媒体发出自己的独立的声音；也有另一种可能，你被媒体利用和改造，你的貌似独立的自己的声音，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权力与利润共谋的工具。而后一种结果，在今天的浑浊暧昧的媒体文化中，绝不是杞人忧天。

关于学院批评的种种特点，包括学院派批评自身存在的问题，在这篇短短的序文里是说不清楚的，不说也罢。我说这些话，放在一本青年人的书的前面，似乎有些煞风景。但这是我今天面对社会文化的现状，真正想说的话。对于“80后”批评家的前景，似乎已经不用操什么心，很快会引起各方的关注和热捧，名利对于他们来说，不过是一步之遥；但是从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真正所要追求的目标来说，可能还任重而道远。

2013年6月23日于海上鱼焦了斋

序

张颐武

徐刚把他近年来的文章结集出版，希望我在前面写几句话。他是我的博士生，多年来潜心读书研究，有了今天的成果，值得庆贺和鼓励。徐刚这些文字的中心议题就是要理解21世纪以来中国当下文学和文化的命运。这也是他和他的同代人开始学术生涯之时就身处其中的时代。他们所经历和见证的当下，其实是充满活力和可能性的，也为未来的学术发展提供了无限的生机。

中国当代的文化和文学的情势在新世纪以来经历了极为复杂和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的轨迹不是断裂式的，而是渐进的，但其复杂和深刻却能够让我们在走过一段时间之后都能领悟得到。这似乎是郭敬明所描述的“小时代”，生活的变化、社会的命运都不再以疾风暴雨般剧烈的状态出现。20世纪那些立即触动和改变千百万人命运的“大时代”的风云已经渐行渐远。支配我们命运的因素和“大历史”的变动都是以“小”和“微”的潜移默化的表征悄然改变我们。我们似乎生活在一个平常的，以日常生活为中心的时代。但经过一段时间，我们才会发现我们走得如此之远。我们近年来所关注的“新文学的终结”“新世纪文化”等等议题，其实就是对于这个复杂而深刻的转变的思考和体认的尝试。

新世纪以来，一方面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化的最关键和最富于生机的部分。中国已经通过加入世贸，申办到举行奥运会、世博会等诸多标志性的事件彰显了自身在全球化中的“位置”。另一方面中国则以在全球生产和消费中的巨大的作用，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与全球的深刻联系形成了构筑这一“位置”的基础。中国已经成为新世纪以来全球化的最重要的推动力。同时，在国内，市场化的深入、城镇化的兴起都带来了一种新的“全

国化”的进程，和全球化交相辉映，形成了波澜壮阔的新的的发展进程。这些过程中有诸多欢乐和痛苦，也有诸多从个人到社会的不可逆转的新的现象出现，为文学和文化的研究提出了新的问题，也在要求着理论的阐释和现实的回应。我们可以发现在理解今天中国复杂变化的过程中，我们的研究似乎尚未能够提供新的角度和思考，尚缺少面对新的问题和现象的方法和路径。我们往往依然在重复陈旧的议题和单调乏味的过时思路，往往还习惯于把过去的模式用来硬套在当下之上。我在20世纪90年代就提出的“阐释中国的焦虑”不但没有缓解，反而似乎愈演愈烈。理论和思考似乎对于自己的时代束手无策，处境尴尬。理论思考的“滞后”显得益发清晰。

因此，如何观察当下文化的变化，如何思考今天和未来的文学和文化，这些议题对于理论提出了紧迫而现实的挑战。我想有一些新的现象其实是一个重要的路标，值得我们由此开始思考。对于21世纪的中国来说，许多现象中有两个现象是最为关键的，也最值得用来标定时代的状况。一是互联网的发展。新世纪中国最为重要的变化就是互联网的影响。互联网已经无所不在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而从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正是当下最重要的趋势。没有什么比起百度、微博、淘宝更加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的东西了。这一变化为文化和文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的体验和新的可能性。二是中等收入群体和“80后”、“90后”年轻人的崛起所带来的社会潮流和趋势的变化。中国在迅速的中产化的同时也在迅速地放大年轻人的影响和作用。这些现象都投射到了文化之中，形成了当下文化重要的、不可逆的变化。诸如网络文学、青春文学等文学现象，诸如新的电影市场的展开，视频网站的影响和新的电视选秀文化等，都是原有的文化之上的新的“增量”。这些都在要求着新的理论的阐释。

从总体上看，如何理解当下的时代，如何认知当下的文化，如何超越“阐释中国的焦虑”，都需要有新的视角和新的方法。徐刚这部书中的文章就是他在这方面的坚实的努力。这些文章可能还不成熟，但其思考和关注点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值得我们细读，并引发新的思考。

徐刚的学术生涯才刚刚开始，他的未来还在展开。希望他能够做出更多的实绩。

是为序。



总 序

陈思和//1

序

张颐武//5

上 编：当代文学研究

重述五四与“当代文学”的合法性论证考察//002

重审“当代文学”的概念与文学史分期问题//017

后革命时代的焦虑

——历史语境中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及其论争//032

“激情”与“理性”的争斗

——20世纪50—70年代工业题材文学及其文化政治//050

空间政治与消费主义幽灵

——以“十七年文学”中的“舞厅”叙述为中心//062

“劳动乌托邦”的建构

——试论20世纪50—70年代工业文学中“劳动”的意义//082

目录 // contents

“摩登”与“革命”的辩证法

——“十七年文学”与电影中的“上海姑娘” //094

“十七年文学”中的“乡下人进城” //110

“工人新村”与社会主义城市的文学建构 //127

“交叉地带”的叙事镜像

——试论“十七年文学”脉络中的路遥小说创作 //137

下编：作家作品阐释

先锋记忆的缅怀与溃散

——评马原《牛鬼蛇神》 //158

时代的精神状况

——评格非《隐身衣》 //166

“讲故事的人”

——评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 //173

消逝的故乡风景

——评陈应松《夜深沉》《送火神》 //178

作为一种历史态度的改革文学

——重评张洁《沉重的翅膀》 //184

现实的激愤与批判的证词

——重评莫言《天堂蒜薹之歌》 //189

屈辱而荒谬的灰暗人生

——阿乙小说论 //195

苍凉而卑微的女性叙事

——孙频小说论//201

新世纪中国科幻文学的流变//211

城市小说和它面对的世界

——新世纪十年城市文学一瞥//225

后 记//234

上 编：当代文学研究

重述五四与“当代文学”的合法性论证考察

关于“合法性”，《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这样写道：“任何一种人类社会的复杂形态都面临一个合法性的问题，即该秩序是否和为什么应该获得其成员的忠诚的问题。”像政治学中大多数关键概念一样，“合法性”指出的是一个真正的“非学术性难题”，这缘于它“所突出的问题会影响到权力和权威的基础，以及由掌权者或掌权者的代表所提供的正当性证明”^①。在现代民主社会，依赖强权政治取得合法性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统治阶层越来越倾向用意识形态的“软化”策略来争取社会的广泛认同，阿尔都赛的“询唤”，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哈贝马斯的“商谈”，都是沿此思路展开的。在哈贝马斯看来，“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即既定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只有从一种具有道德内容的程序合理性出发才能取得，这种程序合理性就是他所说的主体间的“商谈”。按此设想，他希望在“民众政治意志”与“统治者统治理念”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并在这一自由、开放、平等的“交往共同体”中展开“政治辩论”，最终通过特定的“民主商谈程序”将整合后的“民意”上升为政治合法性的规范来源。^②

① [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39～440页。

② [德]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84页；《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73～375页。

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当代文学”^①的历史是因1949年共和国的成立而获得意义的。然而,作为一个“断裂”的文学史形态,“当代文学”(被认为是“新的人民的文艺”)的合法性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尤其是这一问题在其“预设”之初便被设想为意识形态的整合工具,而与巩固新的人民政权、建构现代民族国家这一现代性目标紧密相连。简而言之,“当代文学”的合法性论证就是如何使“当代文学”(包括其早期形态的“工农兵文学”)得到广大知识分子认同的问题。好在这一必不可少的“历史化”过程早在新的人民政权成立之前便已充分展开,这足以保证“当代文学”并非只是借助政治事件的强制权威而取得广泛社会认同。乃至在此后相当一段时间内,这一话语方式演变为一种知识形态而获得普遍的接受和认可,并在文学史的知识框架中被书写、生产、传播和繁衍,伴随其经典化的过程,在意识形态的“整合”之中扮演重要角色。由此,本文将深入“当代文学”其中,探讨其自我表述和建构的问题,从其自身历史传统的建构中发掘其合法性论证的线索。

① “当代文学”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概念。一方面,作为一个学科范畴,它被约定俗成地指称为“1949年以来的中国文学”。在此,“当代文学”仅作为单纯的时间概念来处理,其所指称的文学对象的无限下延性,使得文学流变中新转机和嬗变无法得到恰如其分的命名。这种内在质的规定性的缺乏及含混,势必导致“当代文学”逐渐丧失其文学分期的意义,而被其他命名方式取代,如“20世纪中国文学”“新中国文学”及“50年来的中国文学”等。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文学史概念,“当代文学”又被认为是特定时段文化实践的产物,在其文学史性质的建构上有着明确的规定性,即“社会主义文学”性质。这一点在朱寨、洪子诚及旷新年等人的著述中有着鲜明体现。用洪子诚先生的话说,“当代文学”被认为是“‘左翼文学’的‘工农兵文学’形态”,在20世纪50年代“建立起绝对支配地位”,到80年代“这一地位受到挑战而削弱的文学时期”。因此,它从时间上只是涵盖了40至70年代这段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时期,而与所谓的“新时期文学”“后新时期文学”以及“新世纪文学”有着明确的分野。这样的分期模式无疑能更好地说明一些困扰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大问题。当然,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实践的产物,被赋予了极强的政治动机和意识形态内涵的“当代文学”,在文学“一体化”的进程中有着鲜明的话语实践意义。

一、五四：被建构的“当代文学”“传统”

正如吉登斯所说：“现代性在其发展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一方面它在消解传统，另一方面，它又在不断重建传统。在西方社会中，传统的存留和再造是权力合法化的核心内容，正因为如此，国家才得以把自己强加于相对顺从的‘臣民’之上。”^①传统之所以至关重要，在于它可证明后来者的“正统性”和“合乎规律性”，而这则是合法性论证的关键。急待寻求合法性论证的“当代文学”选择存留和再造五四这个历史传统，而非如20世纪20~30年代左翼人士那样为了凸显新事物的时代意义而诋毁五四，其间有着复杂的历史渊源。五四作为现代中国精神元典的象征意义，及其在知识分子心中的惊人感召力是原因之一。对此深有感触的毛泽东以一位政治家的敏锐将其收归名下，他的《新民主主义论》为此后的“当代文学”写作定下了基调。这里便涉及本文所谓的“重述五四”的问题，即20世纪30~40年代，也就是延安文学时期到新中国建立，毛泽东及其主流批评家对五四所做的不同于此前五四一代人关于五四的叙述和评价（也不同于20世纪20—30年代左翼人士关于五四的否定性评价）。“重述五四”是为了“重塑”“当代文学”的五四传统，并借五四之名（甚至超越五四）赢取知识分子对“当代文学”（左翼文学的“工农兵形态”）的知识（政治）认同，从而获得合法性保证。

“当代文学”是如何改造和接续五四传统的呢？洪子诚先生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有着深入的探讨。他针对周扬对《讲话》（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中简称《讲话》）的评价分析道，“对于周扬等来说，他们既强调《讲话》与五四文学革命的联系（‘继续’），甚至认为是‘五四传统’的最有资格的继承者，同时更强调它们的区别（‘发展’）。就前者而言，他们通过指认五四文学革命的性质和领导权来达到（即认为五四文学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一开始就向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发展’的）；至于后者，则是突出五四文学革命和新文学的缺点（没有能解决文学‘与工农群众结合’这一‘根本关键’问题），来确定五四文学革命与《讲话》之间的等级关

① [英] 安东尼·吉登斯等：《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与美学》，赵文书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72~73页。

系（‘更伟大、更深刻的文学革命’）。这种阐释，是为着使《讲话》及其在文学上引起的变革和出现的成果，成为‘当代文学’的更直接、更具‘真理性’的‘资源’。”^①然而，“当代文学”何以需要借用五四来支撑自己的合法性地位呢？实际上这在很大程度上缘于五四的重要意义，及其在话语流变中所呈现的暧昧身份。

毫无疑问，五四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它所迸发的思想光芒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时至今日，这一思想灵光在知识分子心头仍能激起无与伦比的精神感召力。然而，正如其他许多对后世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关键时刻”一样，历史书写的权力运作使得有关五四的评价歧见丛生。其实，早在40多年前，周策纵先生就认识到有关五四的诸多分歧这一问题，然而，他的《五四运动史》并没能回答“谁的‘五四’”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这并不在于五四运动发生时，各种复杂权力关系的介入和运作，而在于事后各种不同立场的话语对它的想象和言说。周策纵先生就曾将对五四的最有代表性的阐释分为三种，分别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的解释、以国民党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和传统主义”的解释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解释。正是这种历史的复杂性以及“历史与叙述”与生俱来的矛盾，使得每一个时代的人们都只能依据自己的需要梳理历史的主流以支持现实的“正确”性和必然性。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五四这个现代中国的本性事件不得不遭受“当代人”根据自己的“意愿”重述的命运。这种“重述”的历史过程无疑包含着话语介入、重新书写，以及历史占据的意识形态冲动。由此可见，“重述”意味着关于某个对象，已然先在地存在着套叙述话语和表达方式，而这种话语方式因其根源于某种“过去”的、“落后”的思想观念，“不合时宜”的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要遭到由进化史观赋予了历史合理性的“新的思想意识”的辩驳和诘难。换言之，“重述”是“新的思想意识”及其话语方式，在就某个对象的想象和言说上，对旧有叙述的颠覆和改写，在这种话语争斗的背后显然存在着某种权力的交锋。“重述”是一种话语对另一种话语的排斥，是一种权力对另一种权力的倾轧。就左翼激进现代性思潮而言，“重述五四”意味着为“当代文学”的历史叙述建构和发明出一个革命的五四传统，从而为新

①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1页。